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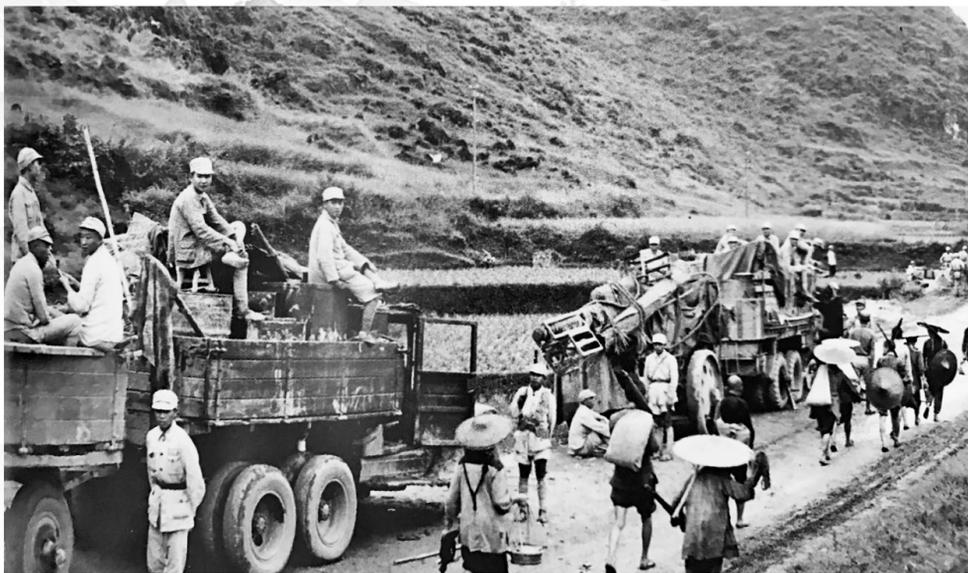
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

特别报道

人民的抗战

——来自抗战大后方的岁月印记

▲抗战大迁徙途中，转运军工器材。



(西南大学供图)

▲抗战大迁徙时，人工转运军工器材。



(西南大学供图)

兵工西迁 洞穴深处的钢铁洪流

“

刚搬到重庆时，工人们都自觉每天工作12到14个小时。可以说上至将军厂长、下到普通工人，都在默默地拼命。

兵工署配给了一台柴油发电机，但又无柴油可用。化学专业的技术员李大声买来当地常见的桐油，经过一番摸索，竟然炼出了“柴油”，终于让机器轰鸣起来；应对原料匮乏，工人将威远铁与少量废钢按特定比例混合，反复试验，摸索出一套可行的炼钢工艺。

■新重庆-重庆日报记者 陈钧 吴刚 实习生 荣桐

手握钢枪，怒吼射击——在重庆鹅公岩长江大桥桥头，一尊抗日军人雕像，傲然矗立。雕像下方的岩壁上，有一排人工岩洞。这里，是在国民政府兵工署第一兵工厂（以下简称第一兵工厂）旧址上建成的重庆建川博物馆。

“第一兵工厂的前身，是赫赫有名的汉阳兵工厂。”博物馆讲解员段恩华介绍，抗战时期，汉阳兵工厂由湖北搬迁至重庆，在此开凿防空洞用于制造武器。

全面抗战爆发后不到两年时间，华北、华东大片国土沦丧。重庆扼守夔巫天险，成为战略大后方，不仅是当时国内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，也是军事中心，肩负着为前线提供武器弹药的重任。

除了汉阳兵工厂，上海兵工厂、金陵兵工厂、济南兵工厂、巩县兵工厂等一大批兵工厂也相继西迁而来。山城近十万兵工人，在物料、装备短缺，生活清苦、头顶轰炸的艰险环境中，争分夺秒“创造犀利的武器”，8年间，供应了抗日军队所需三分之二的枪械、弹药。

“西迁运动，造就了重庆抗战兵工中心的地位。”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周勇认为。

在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，记者来到建川博物馆，但见游人如织。人们穿梭



1942年1月11日，《新华日报》发表通讯《中国民族工业在迈进中——迁川工厂出品展览会巡礼》。（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供图）

于幽深斑驳的岩洞之间，倾听当年机器轰鸣的“回响”，感受那份在炮火中坚守的磅礴力量。洞穴深处的钢铁洪流，是中华民族在苦难中迸发出的惊天伟力。

一场中国版“敦刻尔克大撤退” 日军炮火追击下的搬迁

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爆发，全面抗战的烽火燃遍神州。为了保存民族工业命脉，为持久抗战提供物质基础，国民政府决定将沿海沿江的兵工器材、技术人员和工人向西南大后方内迁。其中，兵工器材从宜昌转运重庆，规模之宏大、过程之艰辛，被称为中国版“敦刻尔克大撤退”。

以钢铁企业的搬迁为例。南京沦陷后，国民政府组建联合钢铁厂迁建委员会，组织汉阳铁厂、大冶铁厂、六河沟铁厂等当时中国主要的钢铁企业，于1938年6月自武汉迁往重庆。

天上飞机轰炸，脚下激流险滩，西迁之路异常艰险。《新华每日电讯》刊载文章《愈炸愈强的抗日“兵器库”》，记载了原钢迁企业员工王遵元老人的一段回忆录——

“走到湖北枝江，说完了，船快翻了。很多人就哭，小孩、妇女们都哭了。后来船主找我说，把这些（炼钢厂的）机器都丢到河里吧，救人吧。我说，这绝不可能！”“结果这个船倾斜到35度，好在下面是泥沙，没有碰到石头，如果碰到暗礁的话，那所有的设备、所有的人全部完蛋。”

搬迁不易，在重庆建立新工厂，则更加艰难。

1940年春，汉阳兵工厂在几经迁徙后定址于重庆鹅公岩，更名为第一兵工厂。之所以选择这里，是因为其独特的地理优势：临江便于水路运输，且地处江岸陡坡，拥有大片可供开凿的坚硬岩壁，为建设地下工厂提供了天然屏障。

没有先进的掘进工具，人们只能用简陋的铁镐、铁锹，在坚硬的岩壁上一寸一寸

地凿；千辛万苦开掘出的山洞，潮湿阴冷，极易锈蚀生产设备，大家只好又开凿连接地面的通风口；面对渗入的地下水，工人们用简易工具舀水，确保机器不被浸泡。

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，第一兵工厂奇迹般地开凿出116个岩洞，建成总面积达2.2万平方米的地下厂房。

资料记载，抗战期间重庆共建起17家兵工厂，聚集9万多兵工员工，分布于江北、沙坪坝、碭江、万州等地。

“国民政府兵器工业继承洋务运动以来中国兵器工业的主体部分，经过全面抗战初期的大规模迁建，在西南地区形成兵工生产基地，为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坚持抗战作出重要贡献。”刊发于《抗日战争研究》的《关于抗战时期中国兵器工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》一文，这样评价道。

重庆兵工厂的内迁与地下生产，展现了中华民族在战争浩劫中为生存和胜利而奋斗的卓越智慧。

一种蓬勃的创造力 “常规武器大多能充足供应且有盈余”

在日军炮火追击下完成搬迁并建成新工厂，还要生产出合格的武器，绝非易事。

在建川博物馆兵工史展览区，一支支乌黑发亮的步枪、机枪，一款款军绿色掷弹筒、迫击炮，静静陈列。

“这些都是抗日的武器！如这款二七式掷弹筒，是当时重庆兵工厂企业自行研制的优秀兵器，性能远优于日军同类装备，在战场上有力杀伤了敌人。”博物馆讲解员介绍。

像二七式掷弹筒这种由重庆兵工厂仿制甚至自行研制的兵器，多达数十种。据《愈炸愈强的抗日“兵器库”》记载，第二十一兵工厂改良升级捷克式轻机枪，能立射、跪射、卧射，还可以高射低飞的飞机，每分钟射速达250发至300发；第三十兵工厂试造成功二七式掷弹筒，装拆简单，调整射需时极短，每分钟可发射20发，批量投入战场后，大大削弱了日军近战火力优势。

武器不仅质量高，而且数量足。据重庆市档案馆研究员唐润明的研究，1938年到1945年，重庆主要兵工厂共生产各种枪弹8.5亿发，炮弹近600万颗，步枪近30万支，轻重机枪3万余挺，火炮1.4万门，掷弹筒6.8万具，甲雷42万多颗。“当时抗日战场所需的常规武器，诸如重机枪、迫击炮、掷弹筒、手榴弹等大都充足供应且有盈余。”他说。

在电力、燃料、原材料都极度匮乏的抗战时期，要保质保量生产这些武器，其难度可想而知。

例如，第二十一兵工厂铜罐驿分厂位于九龙坡铜罐驿镇，80多年前，这里不通电。兵工署配给了一台柴油发电机，但又无柴油可用。化学专业的技术员李大声买来当地常见的桐油，经过一番摸索，竟然炼出了“柴油”，终于让机器轰鸣起来；应对原料匮乏，工人们将威远铁与少量废钢按特

定比例混合，反复试验，最终摸索出一套可行的炼钢工艺。

兵工厂工人的生活，也是个大问题。建川博物馆讲解员介绍，当时，兵工厂很多工人都是拖家带口从东部迁来，没有固定的住所，只能将家安在兵工厂附近的简陋窝棚里，甚至直接把床铺搬到洞口附近。

据第二十一兵工厂子弟、重庆师范大学教师郑洪泉在《李承干传》中的描述，第二十一兵工厂厂长李承干，办公室背后靠墙一张单人床就是他的卧室。不管多晚睡，有事随时要叫醒他。

“刚搬到重庆时，工人都自觉每天工作12到14个小时。可以说上至将军厂长、下到普通工人，都在默默地拼命。”《愈炸愈强的抗日“兵器库”》一文中，郑洪泉这样描述父辈们夜以继日劳作的场景。

这种攻坚克难的“精气神”，转化为蓬勃的创造力，催生出改变历史的物质力量。

一部关于坚韧的史诗 民族危亡关头，每个人都能迸发出惊人的力量

如何躲避日军轰炸，是重庆兵工厂在生产中面临的另一大考验。日军对重庆实施了战争史上罕见的大轰炸，持续6年10个月，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。

兵工厂作为日军重点打击的目标，如何应对随时到来的轰炸？以第一兵工厂为例，这里的地下岩洞并非孤立，而是通过腰洞相互连接，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地下生产网络。各岩洞分工制造零件，通过腰洞相互传递，最终组装成武器。这种“洞内串联生产”模式，不仅躲开了轰炸，还提高了效率，为不少兵工厂效仿。

除了将生产线深藏地下，工厂还采取分散布点和隐蔽生产的方式。一些辅助环节，例如原材料的初步处理、成品的运输等在夜间进行，以躲避白天的轰炸。

第二十一兵工厂则调整工厂布局，坚持在地面生产。当时担任铣工的胡学佑回忆，重要的设备都是独立放置，间隔很远，每间厂房外还堆着木材和各类工具，“轰炸一完，我们就可以马上搭建临时厂房复工生产。”

兵工厂的日常生产和扩建，需要大量的原材料和劳动力。第二十七兵工厂在万县设立后，除了内迁人员，还陆续从重庆、万县及周边农村招募工人。兵工厂周边涌现的服务业，也为兵工人的生活提供了便利。

抗战时期重庆兵工厂的故事，是一部关于坚韧的史诗。在民族危亡的关头，每一个普通人都能迸发出惊人的力量。山洞深处的钢铁洪流，不仅铸造出枪炮弹药，更激发出一种精神——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、团结协作、无私奉献。这些兵工厂的旧址，今天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成为后人铭记历史、弘扬抗战精神的活教材。

▼重庆建川博物馆，兵工署第一兵工厂在洞穴中的生产场景展示。（资料图片） 记者 熊明 摄/视觉重庆

